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伍江

日本对华政策 转变期间 (1952—1972) 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张文彬 著

013065033

D831.30

11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伍江 主编

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期间(1952—1972) 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张文彬 著



D831.30

11



北航

C1672934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现有出版物对于中日建交前的民间外交史,多从中国的角度研究,本书将研究点转移到日本。本书认为,中日两国还未正式建交的状态下,不是直接决策主体,而是常常被忽略的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了重要影响。书中对为什么民间力量有条件成为推动中日复交的积极因素、这些力量通过何种方式影响执政主体的对华决策、日本先于美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社会基础来自哪里等问题作了深入和独到的分析。本书可供国际关系及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期间(1952~1972)民间因素的影响
评析/张文彬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0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伍江主编.第2辑)

ISBN 978-7-5608-4992-8

I. ①日… II. ①张… III. ①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952~1972 IV. ①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543 号

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期间(1952—1972)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张文彬 著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责任校对 徐春莲

装帧设计 孙晓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75

印 数 1—1100

字 数 181 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992-8

定 价 24.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的第二辑和读者见面了。

和第一辑的七本书一样,这一辑也是选题广泛而无专题。作者均来自同济各人文社科院系的教师,显示了近年同济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丛书这一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近年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状况和总体水平。当然,和国内各人文社科强校相比,同济的总体差距是明显的,但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同济大学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我们相信,人文社科的发展对于同济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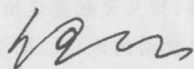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当今世界知名一流大学里,即便是传统的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加重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也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今人类新知识的产生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而文理交融又是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福祉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道德的挑战,工具理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理性的质疑。人文精神的更多介入,正是科学技术跨越道德门槛的一把钥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同济大学在中国一流大学的队伍中一直以工科见长,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卓越工程师,为祖国的建设和富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苏式的单科式学科布局也为同济大学向着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局限。为此,同济大学近30年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多学科办学,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和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并将此看作同济大学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必由之路。同济历史上曾经是一所理、工、文、法、医都名列国内前茅的大学,各学科相互支撑、相互交融使这所中国最早之一的大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同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自我定位。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同济大学的学科已经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艺术、教育学等10大门类,真

正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坚信,当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扩充与突破更需要当代科学技术最新知识与最新成果的直接滋润,而当今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介入。同济大学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同济大学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然而,历史创伤的愈合需要时间。与超过百年连续办学历史的工科学科相比,同济的人文社科却命运多舛。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断裂后的学科接续与重振,即需要勇气(这一点我们已经具备),更需要长期积累与沉淀。厚积才能薄发。同济在这方面已做好准备,但需要时间。同时,同济也需要聚焦。人文社科领域浩瀚无边,后起者更需要选择突破口。作为人类价值观的主要学术载体,今天的人文社科也面临着新的价值观的考验。人类道德已从传统的人际层面、族际层面和国际层面向代际层面延伸。我们的人文社科学科能否担负起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责任? 同济准备以此为契机,将之作为同济人文社科学科的突破口。

同济具备很多传统优势,也具备很多新的优势。同济有长期的对德合作和欧洲研究传统,我们在欧洲哲学与欧洲文化研究领域,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在艺术设计领域,都已形成国内领先的学术力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和职业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也以集聚了相当的学术队伍。厚积仍在继续,薄发指日可待。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向读者打开一个关于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门缝。丛书中各位作者的学术深度必有参差,其中青年学者的作品也难免青涩。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开端,起点不高却可长久持续。我们更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激励起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仁们更高的学术热情,从而付出更多的学术投入,获取更丰富的学术成果。

我们期待同济人文社科丛书越出越多,越出越好。



2012年10月30日于同济绿园

前言

很多读者对 1952—1972 年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本人也想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心得。

众所周知，民间外交主要是中国根据二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来的，也是根据当时中日两国人民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而展开的非官方往来。从经济、文化开始，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通过以民促官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促进官方关系的前进，最后达到国家关系正常化。民间外交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创举，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间外交在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了解世界，以及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团结与合作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没有从中国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的通常路径入手，而是从日本民间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因素这个角度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战后中国和日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虽然在旧金山和会之后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日本的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美国。美国不但在日本境内设置了军事基地，而且试图把它建成遏制共产主义的主战场。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性质决定了日本对华外交行动的被动态势。战后中国选择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也曾多次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干涉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领导人强硬的处事风格和经济、军事上的独立，使中国免受苏联干扰，并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对日方针。在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领导下，中国一方面与美国和日本制造的“两个中国论”作斗争，另一方面挖掘中日两国的民间因素，在“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下开展对日贸易，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积蓄力量。由于战后日本政府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断绝了与中国大陆的官方往来，谋求中日友好的民间有识之士自发地组成多个对华贸易和访问团体，突破经济封锁和政策限制，恢复了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并逐渐成长为转变日本消极对华政策的影响因素。“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坚持了 20 年之久，从最开始的限制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对华活动，到后来允许并支持具有半官方性质

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的建立,再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改变时借助民间力量的帮助,推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其自相矛盾性和民间因素的巨大影响力。

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特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到验证。尽管航道中有暗流,有险滩,但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地理位置的临近、中日间源远流长的经贸与文化交流,使两国在没有正式外交渠道的情况下率先恢复民间交流,并借助民间交流范围的扩大和交流等级的加深,逐渐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本书通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的考察,着力弄清为何中日两国在战后经历了20年的曲折才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动力来自哪里;日本民间因素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变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因素在今后中日交往的过程中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等问题。

因涉及的历史时期和研究对象较为复杂,本书力图在繁杂的史料中挖掘支撑论点的有用材料,理清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组织成框架结构相对严谨的研究成果。希望读者能够从日本民间对华交流的角度了解这段广为人知的中日关系史,并从中获得一些收获。本书采用了归纳法与演绎法交替使用的方法。第一、第二章对相关理论和历史背景作了分析和阐述。之后的几章按照历史顺序分析了二战结束后直至中日正式建交前各个阶段日本的民间因素影响对华决策的具体过程。最后两章分别对日本的各类民间因素主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特点以及民间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式进行了演绎分析和论证。

除了对历史史料的整理,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未必成熟的观点和想法。例如,依据近年来中日关系以及外交决策等问题的研究心得,将1952—1972年期间日本对华决策转变过程中各类民间因素如何影响对华政策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梳理,并提出:不但政府间关系的好坏可以影响民间交流的发展,而且民间往来也会反作用于一国的外交决策,有时候甚至成为影响外交政策转变的关键性因素。本书将1952—1972年间对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因素归纳为四大主体:经济界、在野党、执政党中的某派别以及公众舆论,并且对这四类民间因素主体的活动过程及特征作了分析和概括。此外,本书对日本对华决策中民间因素的作用模

式作了探索性研究,力图准确地界定间接影响方式和直接影响方式的概念及其形态,评述它们在影响日本对华决策方面的效果。尽管这些定义和观点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但是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概括,应该说对中日关系以及外交决策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路径。

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虽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更多地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环境,但中国对日民间外交路线和日本民间因素的积极响应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和现实土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美依存的外交方针和“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限制了中日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间接地促成了民间因素在对华交流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事实。在民间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改变既定的对华方针,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消极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逐渐增加中日民间交往的政府干预程度,客观上提升了两国交往的层次。随着中日两国间友好力量的壮大,对华复交呼声的高涨,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中美接近的催化剂出现时,日本做出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选择。民间因素在中日复交过程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演绎及背景分析、历史发展分析和结语。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理论演绎和背景分析部分,为下文展开作铺垫。

第一章先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入手,阐述本书的选题宗旨、研究目标和方法、相关概念解析等;概述日本外交决策模式的主要特点,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对华决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路径。

第二章主要分析亚洲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首先,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断绝了中日官方交往的渠道,但日本在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为合法中国政府的同时,仍希望保持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于是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成为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渠道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主要力量。

历史发展分析包括第三章至第七章。其中第三章到第五章以历史发展为线索,阐述各个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对形成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

第三章首先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政府四任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往来的实践情况。接下来以经济界为对象,考察民间

因素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何种形式影响日本的对华决策,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阐述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濒临失效的过程。60年代初,日本政府认识到完全抛开政治关系发展中日贸易的局限,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日贸易的政府参与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自民党内的松村谦三集团¹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主要以非官方或民间人士的身份开展对华活动,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影响政府对华决策。60年代后期“政经不可分”与“政经分离”的论战加剧,消极对华政策不断受到挑战,日本国内逐渐形成恢复中日邦交的社会基础。

第五章主要分析1970—197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中日复交过程。这一时期两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与战后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中美接近等国际缓和的总体背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到一定影响。在日本国内,经济界团体、大众舆论、在野党和松村谦三集团形成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力量的联合行动,给政府转变消极对华政策不断施加压力。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和日本于1972年9月29日最终实现了两国的邦交正常化。

从第六章和第七章开始进行专题研究。

第六章主要分析日本各类民间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特点。中日之间恢复外交关系,不是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决,而是通过民间或半官半民的方式首先提升两国交往层次,待时机成熟再由民间外交转为官方外交,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国家建交过程。在这一章节里,首先考察了民间因素的主体性特点,其次对各民间主体发挥作用的阶段性特征和效果进行了评估,从整体上把握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转变的影响。

第七章对民间因素的作用模式进行了分析,分为间接影响方式和直接影响方式两种。间接影响方式又称为体制外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通过与中国签订经济协定、访华、在媒体发表社论等形式夯实中日复交的社会

[1] 根据翟新在《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一书中的定义,松村谦三集团是指先后集结于松村谦三伞下,参与LT贸易或备忘录贸易等具体的对华经济及文化交流活动,而在松村谦三去世后仍基于先前的对华理念和立场,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及实业家为核心的群体。翟新:《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页。

基础,给政府的对华决策施加压力,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民间因素主要通过间接影响方式发挥作用,是影响对华政策转变的主要途径。其次是直接影响方式,松村谦三集团等自民党政治家和在野党在决策层内部通过对决策主体谏言、批判错误的对华行动等方式,对转变对华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但这一方式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结语部分分析民间因素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外交的发展趋势。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尽管当前对中日复交时期的历史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过去多从中国的角度考察分析,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总结民间因素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专著问世,为此本书愿意做这样一种尝试。1952—1972年间,由于日本政府在中日邦交问题上态度消极,因此民间因素担当起日本推动中日复交的重任。他们虽然不能左右执政主体的对华决策,但随着人数的由少到多,力量的由弱到强,民间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日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还是在全球化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都不能忽视民间因素在推动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历史作用。

第二,得益于在日本访问交流过程中搜集一手资料的便利,本书所用的史料有些来自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有些来自日中友好协会,参考的文献也多为日文原版论著。除此之外,还有冷战史研究中心收藏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日政策,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著述得出的结论比较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在若干章节中采用了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使本书的观点具有较强的实证基础。

第三,本书研究方法的创新是:除了按照常规历史顺序对民间因素的影响进行梳理之外,还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从主体和作用模式上进行了分析,这样就把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清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除了运用演绎方法对民间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进行阐述之外,还运用了归纳的方法提炼整理,以此提高论证的严密性。

本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定位在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方

面,主要是因为民间交往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民间因素的研究,不但可以理清中日关系的历史,把握时代主旋律,促进将来合作,而且有助于理解民间因素对发展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民间因素的影响方式毕竟有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民间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愈显突出,通过加强民间交流,达到改善两国关系或地区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的目的,越来越成为发展周边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途径。这在本书结语处虽然有所提及,但并未对此做深入探讨,待将来时机成熟之际,笔者将结合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对民间因素做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章 外交决策中的民间因素及其理论阐释	(1)
第一节 研究综述及选题意义	(2)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2)
二、本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6)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10)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与解析	(10)
二、研究方法	(17)
第三节 外交决策理论与模式	(18)
一、外交决策主体	(18)
二、外交决策模式	(21)
第四节 日本对华决策中的民间因素	(24)
一、日本外交决策的总体特征	(24)
二、1952—1972 年日本对华决策模式的特点——民间因素 作用凸显	(26)
第二章 民间因素影响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	(36)
第一节 战后亚洲地区国际格局的特殊性	(36)
一、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国际格局的形成	(36)
二、中日官方交往渠道的中断	(39)
第二节 冷战格局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	(43)
一、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44)
二、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47)
三、民间因素在维系对华接触渠道方面的作用	(47)
第三章 1952—1960 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形成与 民间因素的影响	(50)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50)

一、旧金山对日和谈之后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50)
二、鸠山一郎内阁的对华政策	(52)
三、石桥湛山内阁的对华政策	(55)
四、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	(56)
第二节 民间因素的影响:经济界推动四次	
《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案例	(58)
一、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	(58)
二、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	(60)
三、20 世纪 50 年代民间因素在日本	
对华决策中的作用	(64)

第四章 1960—1969 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发展与

民间因素的影响	(68)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69)
一、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	(69)
二、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的局限性	(70)
第二节 佐藤荣作内阁早期的对华政策	(71)
一、佐藤荣作内阁早期的对华政策	(72)
二、池田勇人内阁与佐藤荣作内阁早期	
对华政策的比较	(74)
第三节 民间因素的影响:松村谦三集团	
促进 LT 贸易达成案例	(75)
一、20 世纪 60 年代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	(75)
二、LT 贸易的发展过程	(77)
三、20 世纪 60 年代民间因素在日本对华	
决策中的作用	(80)

第五章 1970—1972 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失效

与民间因素的影响	(84)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佐藤荣作内阁的政策调整	(84)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85)
二、佐藤荣作内阁的对华政策调整	(87)
第二节 田中角荣内阁对华政策的转变与	
中日复交的实现	(89)
一、田中角荣内阁的对华复交行动	(89)
二、《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92)
第三节 民间因素的影响:在野党在中日复交	
过程中充当沟通渠道案例	(94)
一、20 世纪 70 年代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	(94)
二、作为沟通渠道的在野党	(96)
三、20 世纪 70 年代民间因素在日本对华决策中的作用	(99)
第六章 日本对华决策中民间因素的主体分析	(102)
第一节 积极促进对华交流的经济界	(102)
一、经济界的成员构成	(103)
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	(104)
三、效果评估:开拓对华交流渠道,提升中日交往层次	(106)
第二节 发挥补充外交作用的在野党	(107)
一、在野党的对华政策与立场	(108)
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	(110)
三、效果评估:批判消极对华政策,搭建中日谈判桥梁	(112)
第三节 作为政府对华联系管道的松村谦三集团	(113)
一、松村谦三集团的性质分析	(113)
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	(115)
三、效果评估:建立政府对华联系的渠道	(116)
第四节 约束政府消极对华政策的公众舆论	(118)
一、公众舆论的包含对象	(118)
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	(119)
三、效果评估:形成转变消极对华政策的强大压力	(121)
第五节 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主体特征	(122)

第七章 日本对华决策中民间因素的作用模式分析	(124)
第一节 民间因素的作用模式	(124)
一、民间因素作用模式的划分依据	(124)
二、民间因素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具体方式	(127)
第二节 间接影响方式	(128)
一、经济界的对华经济交往活动	(128)
二、对华人员交流活动	(132)
三、间接影响方式的作用评析	(135)
第三节 直接影响方式	(137)
一、在野党在国会中的牵制活动	(138)
二、松村谦三集团在自民党内的制衡活动	(139)
第四节 民间因素作用模式的特征	(139)
一、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140)
二、活动方式灵活多样	(142)
三、政治家的个人影响突出	(142)
四、作用间接但持久	(144)
第八章 结 语	(146)
第一节 民间因素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146)
一、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	(147)
二、中国对民间因素的重视	(149)
三、民间因素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153)
第二节 民间因素与全球化时代的外交	(157)
一、民间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	(158)
二、全球化时代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外交的发展趋势	(163)
附 录	(170)
参考文献	(187)
后 记	(198)

第一章

外交决策中的民间因素及其理论阐释

对过去视而不见者，对现在也必然盲目！

——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 Weizsacker)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但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二战后日本的战败没有使中日关系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而是经历了20年曲折之后才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不能完全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意愿，本应实现正常邦交关系的中国和日本被迫分隔开来，成为美苏为巩固和扩大对立阵营在亚洲设立的前沿阵地。虽然中国方面始终坚持中日两国应尽快复交的原则立场，但是出于尽快从战争中复苏的考虑，日本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选择了对美追随的外交方针，并制定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从此割断了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渠道。以经济界、在野党、松村谦三集团和公众舆论为代表的民间人士很快冲破了美国对华封锁，与中国建立起贸易往来关系，通过各种途径的接触和交涉提升中日交往的层次，为恢复中日邦交关系积蓄力量。随着中美接近和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的重新组合，在中国与日本民间因素的联合推动下，经过20年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条件逐渐成熟。1972年田中角荣组阁后日本最终放弃消极对华政策，走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轨。

本章围绕日本对华政策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介绍与此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并从外交决策模式理论中挖掘民间因素影响对华决策的现实路径，搭建起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节 研究综述及选题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迄今为止,中日学术界涉及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论著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在两国外交史的框架内把握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论著;二是以战后中日关系为对象的论著;三是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评传,现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第一类关于在两国外交史框架内把握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论著,中国已出版的主要有:廉德瑰的《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把美日两国对“中国”和“台湾”的定位作为焦点,以1951年的旧金山和会到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为背景,对战后中美日三国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重点放在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宋成有编著的《日本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的《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的关系》(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96年)等。日本学界相对中国来说,对此问题似乎更加关注。绪方贞子(英文版,由添古芳秀译成日文)在她的《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分析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为止的中美、中日关系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并且探讨了美国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异同点。在小岛朋之编写的《亚洲时代的日中关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社,1995年)中,9名研究者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增田宏与波多野澄雄编写的《亚洲中的日本与中国——友好和摩擦的现代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年),集合了14名研究者的共同研究成果,对中日两国间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变迁,日本国内政治与外交的关联,中日关系与美国、苏联、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对中日关系的立体构造也做了探讨。

第二类是以战后中日关系为对象的论著,所占的比例最大,在此不一